

透过一座修女院，回眸山东百年传教史

左手《圣经》，右手《论语》

最近，据传济南市历山路47号的原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院要被拆除了。从这座百年修女院出发，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，这一百多年里，来到山东的修女和传教士们，都带给了我们什么？办学校、办医院、办福利院、种葡萄、种樱桃……虽然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以传教为目的，但是我们收获的，却不仅仅是宗教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传教士进孔府

在济南泉城路附近将军庙街的小巷子里，隐藏着一座天主教堂，它看似低调，其实是济南天主教爱国会所在地。而这个教堂的历史，要追溯到365年前。

清朝顺治七年(公元1650年)，从西班牙漂洋过海的天主教教士嘉伯乐来到济南，看中了将军庙这块地方，便买下来建了一座教堂，这算得上是济南最早的传教士活动。不过，当时的人们并不买洋教的账，据说这个教堂刚建立，济南人民就在四周各建了一座关帝庙，以示包围镇压。到了雍正二年(公元1724年)，济南爆发反洋教运动，这座教堂被一把火烧毁，传教士们也被赶回了老家。

两百年后，到了十九世纪中期，洋人们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叩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给传教铺平了道路。1861年，烟台正式开埠，传教士们闻风而动，甚至提前一两年就来打探消息，准备进驻。

山东，是孔孟之乡，是儒家思想最坚挺的地方，传教士们最担心的是耶稣怎么和孔子相处的问题。所以十九世纪后期刚到山东的传教士们，一开始是小心翼翼地试探，不敢太过张扬。他们甚至入乡随俗，学习汉语，穿起汉衣，留起长辫，以此来拉近与人民群众的距离。比如说，在济南和烟台传教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，一开始只传播福音，没人搭理他。后来他就穿着长袍马褂拖着长辫，“一手握《圣经》，一手持《论语》，如听众不愿听基督教则另讲以孔教。”在当时传教士办的印刷厂里，通常是一边印刷圣经，一边印刷孔孟经典。

20世纪初在兖州、曲阜等地传教的美国圣言会，甚至特地去拜见孔家后人，顺便朝圣中国的圣贤，当然他们心中揣着的美好愿望是：希望孔子的子孙后代也能投向主的怀抱。当时，天主教兖州教区主教韩宁镐，在大冬天里，踏着三尺厚的雪，去拜见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，从早上等到下午，被接见后他兴奋不已，在日记里大书特书。

谦卑的传教士们的确博得了孔家的好感，后来，孔令贻还跑到兖州的教堂里去给他们“拜年”，孔令贻的妻子生产的时候，他特意请来两名来自济南的基督教女传教医生，两名来自兖州的传教修女，为小男孩的诞生作证。

山东大学和清华大学

传教士的心态在二十世纪初逐渐改变。随着清末民初一系列现代化的尝试，中国开始主动接纳西方文化，社会风气变得开放。这时，传教士们也放得开了，他们开始尝试更为有效的传教策略，比如说办学校。

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天路说，这些传教士深入乡村，建立学校，利用西学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，一时领风气之先。

科举废除后，新式学堂逐渐兴起。可是在山东各地，很多地方官根本就没见过新式学堂长啥样，这时，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传教士们。比如兖州的官员就请德国传教士建立了“华德学校”。此外，传教士们还大胆设立女校，比如美国传教士郭显德在烟台创办了男女分校。一开始女校根本招不到人，他们用提供免费教学和食宿的方法，才渐渐打开局面。

当时的传教士在齐鲁大地上建立的最有名的一所学校叫做文会馆，1864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毕业5年、10年、15年后，你是屈身蚁族还是位列显贵？法官跟流浪汉的儿子毕业了能否还在一起喝咖啡？一张毕业照真能“预知”同学们的社会地位吗？大学毕业后开始的经济、社会地位分化始终是人们心照不宣的热门话题。

根据一项心理学分析，毕业后，85%的人会循规蹈矩，15%的人则离经叛道，虽然这一小撮人可能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，但真正能吸引人们眼球的却是他们。

前几天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：你在毕业照里站在什么位置，决定了你将来发展成什么样。

看完这个说法，大多数人都“呵呵”了，但济南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医生、社会心理研究者赵丽梅却认为有几分道理。赵丽梅说，根据学生们的兴趣爱好、能力水平，每个学生在班级里的心理地位是



1939年，玛利诺会一名修女在广西平南，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国军士兵治疗。(资料片)

夫妇建在登州的一座破庙里，后来几经波折，迁到济南，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——齐鲁大学。

这所教会大学最早的校长是洋人，学生是基督徒，课程里要学习神学，但后来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，成为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，老舍曾来此当过文学院院长。袁世凯创立的山东大学前身山东大学堂，就是模仿这所学校建立的。齐鲁大学后来被撤销合并，成为山东医科大学，再后来，山东医科大学与山大合并，自此，山大也喜欢将自己的校史推到1864年。

而对整个中国教育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传教士，是鲁西北运河边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。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，叫《中国人的素质》，里面列出中国人27条缺点，比如死要面子、言不由衷等等，痛骂中国人。但也就是这个人，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言，劝说总统将“庚子赔款”用办学的方式返还中国。1908年，美国把一半的“庚子赔款”1160余万美元还给中国，让清政府用来培养留学生，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也因此成立，这就是清华大学。

修女也疯狂

除了学校，传教士们最喜欢办的还有医院。刘天路说，早期传教士里基本没有专职医生，不过很多人有一定的医学知识，传教的时候顺便发发药，治疗简单的病。后来发现管用，就开始发展专门的医疗事业，引进一些专业的医生。19世纪末，他们开始开办医院，一边治病一边传教。

我们熟悉的齐鲁医院，就是1890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建立的。济南上市立二院以前叫做若瑟医院，若瑟是耶稣的养父。这家医院在1923年由美国修女建成，里面有10个美国修女，20个中国修女，她们都不拿薪水，义务劳动。据洪楼天主教堂的教友王玉和回忆，解放前，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里只有一个人不是教徒。

与传教士相比，修女们更为深居简出，不被世人所知。她们献身于主的信仰，不太参与社会活动。除去医院，她们也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，建福利院，收养孤儿和老人。

济南这所据说要拆除的天主教方济圣母传教修女会院，1908年由修女玛利亚创办，其下就设有安老院和孤儿院。据教友刘春云(化名)回忆，这里以前是仁慈堂，一些没人要的婴儿和没有父母的孤儿，都会被修女们收留。修女们自食其力，一边自己织布、纺线，一边养活这些孩子。

刘春云说，她的母亲在旧社会就是一个孤儿。“我母亲家在烟台，她十来岁的时候，姥爷得罪了财主，被打死了，她便跑到附近的教堂里，跟着修女生活。后来去了北京，跟着外国人学了八年钢琴。”

她的母亲本来发愿做修女，不过解放后修女

不存在了，她才在三十四五岁的时候结了婚。刘春云说，母亲遇见的神父来自加拿大，家里很有钱，他变卖家产只为来中国传教，解放后也没有走，最后死在了中国。

虽然如此，修女们并不被所有人理解，很多人猜测她们不安好心。王玉和曾经以为修女们不干好事，拿孩子做实验，后来他碰到东关附近的韩修女，韩修女说，“你这傻孩子，你也不想想，好人家的孩子谁会扔给孤儿院呢。他们都是趁晚上没人时候，把孩子放到教会门口，第二天一早就被修女们发现。有的孩子治疗后活了下来，有的治不好就死了，然后被埋掉，这反而成了罪证。”因为这一席话，王玉和后来走上了信教之路。

修道院被改成集中营

可以说在解放前，活跃在齐鲁大地上的传教士和修女，与普通山东人民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而让世俗和宗教最为紧密联结的，是发生在潍县(潍坊)的一个悲惨故事：修道院乐道院化身为日军集中营。

乐道院建立于1883年，由美国传教士狄乐伯夫妇在潍县建立。二战时，美国加入反法西斯战争，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后，日本人对美国的仇视加剧，为了报复美国，日军把这个美国修道院给占领了，同时把美、英等国的旅华侨民都关了起来，这里变成了一个悲惨的集中营。

从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，长江以北的两千多名外国侨民被关押在其中，这里面有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、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、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等。

这些被关押的人里，有一位传教士名叫埃里克·利迪尔，他曾经是奥运会400米冠军。当时集中营里关着300多名儿童，利迪尔排除各种困难，给这些孩子上课，教英语。遗憾的是，没有等到抗战胜利，利迪尔就病死在集中营里。

此外，集中营外朴实的潍县人民也尽了很多力。他们与里面的外国侨民里应外合，给他们送吃的、送信。当时有个挑粪工叫张兴太，经常出入集中营挑粪。有一天，美国人德位思偷偷塞给他一封信，让他送到黄乐德牧师手中。信里写的是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多么凄惨。收到这封求助信后，黄乐德到处募捐，得到了10万美元，通过瑞士(中立国)驻华使馆向日军交涉，将款项及以此购买的衣食药品辗转送进集中营。

解放后，传教士都被遣返回国，中国修女也被迫还俗。传教士成为一段尘封的历史。这段历史，带给中国的有屈辱，也有收获。别的就不说了，就说山东烟台的特产大樱桃，就是当年的传教士倪维思引进的，他最初栽种在烟台的东南山，如今这些樱桃树已经遍布山东半岛沿海各地了。

大学一毕业，分化开始了

你是那15%，还是85%？

不一样的。照毕业照的时候，那些特别爱表现自己的同学，一定会坐在老师的身边，或者占据最突出或最醒目的位置，有一些比较低调的同学，虽然很有能力，但是会选择站在边缘或者最后一排，不引人注意。

毕业后，各自的性格也会延伸到工作中，每个人对人际关系、事业的处理必然会不同。

毕业5年聚会，同学之间的分化一般出现在

房子、车子与职业上；10年后，大家对分化的考量开始瞄准权力地位。若是拼家境换来的成功者，同学们会相视一笑；若是有人凭能力与运气崛起，一些自认没有努力改变过的人难免要叹气了。

有人觉得，由于男、女被社会赋予的期望不同，对于经济、社会地位的分化，男同学比女同学更敏感。